

阿克顿勋爵

Lord Acton



〔英〕罗兰·希尔/著
冯克利 苗晓枫/译

中国方正出版社

阿克顿勋爵

〔英〕罗兰·希尔 著

冯克利 苗晓枫 译

中国方正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京版登字：01-2016-97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克顿勋爵 / (英) 罗兰·希尔 (Roland Hill) 著;
冯克利, 苗晓枫译.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7. 1

书名原文: Lord Acton

ISBN 978-7-5174-0373-9

I. ①阿… II. ①罗…②冯…③苗… III. ①阿克顿-传记
IV. ①K835.61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7527 号

Copyright © 2000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ina Fangzhe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阿克顿勋爵

[英] 罗兰·希尔 著

冯克利 苗晓枫 译

选题策划: 陈学军

责任编辑: 陈培凤

责任印制: 李 华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编辑部: (010) 59594627 发行部: (010) 66560933

出版部: (010) 59594625 门市部: (010) 66562755

邮购部: (010) 66560933

网 址: www.lianzheng.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7.5

字 数: 6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74-0373-9

定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米娅·伍德拉夫的话

作者按：

霍恩·玛丽·依玛克莉·安托瓦内特（米娅）·伍德拉夫，阿克顿勋爵二世的七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位。尽管她从未见过祖父阿克顿勋爵一世，但一直怀念他并努力践行他的理念，熟知他一生中从事的艰苦斗争。她曾和丈夫道格拉斯·伍德拉夫（1978 年去世）一起，在家族的奥登翰姆宅邸（现已出售）临时保管家族的大量文件，供学者们随时研究取用。这些档案最终落户于剑桥大学图书馆。

她丈夫担任英国天主教周刊《铭文》（*Tablet*）主编长达三十一年，和他一样，米娅·伍德拉夫也是她那一代天主教徒中的领袖人物。她是名副其实的贵妇人，灵魂伟大，头脑敏锐，信仰笃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她在许多志愿社团中关爱他人，尤其是那些不同种族、持不同信仰的难民。当她被安葬在牛津郡莱福德圣公会教堂墓地她丈夫身旁时，她在战时担任伦敦空袭报警员时戴过的钢盔与她一起入土，这与她非常相配。她写完下面这些话后不久，于 1994 年 3 月 5 日离世，享年八十九岁。

* * *

我从未见过祖父。他 1902 年离世，而我出生在 1905 年。我对他的了解都是姑妈玛米告诉我的。她是祖父最宠爱的孩子，他给她写过极精彩的书信，向她讲过许多美妙的人生往事。我把他想象成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在阿尔科家族的上奥地利度假别墅圣马丁长时

间陪着未来的新娘和他深爱着的未来岳母，后者对他影响甚巨。我想象他待在奥登翰姆他亲自建起的大图书馆，置身于汪洋书海中，可惜图书馆后来被拆除，如今这些书籍存放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我想象他在巴伐利亚州的泰根湖，阿尔科家族在那里有一栋可爱的别墅，我在孩提时代常和弟弟住在那里。它是一所极漂亮的木屋，四周是阳台，周边长满了马鞭草和紫藤，花园直通湖畔，我们常在那里垂钓。祖父在那里安度晚年并葬在泰根湖。祖母和两个女儿仍然住在那里，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她们搬到瑞士，在那里我的两位姑妈先后去世，安妮死于1917年，西米死于1919年。此后，祖母来到奥登翰姆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1923年4月2日过世。布里奇诺斯教堂有一块纪念祖父和阿克顿家族不同成员的牌匾。他曾经代表布里奇诺斯选区担任下院议员，并协助建造了教区的圣约翰教堂。

我觉得祖父是靠自己的良知活着，这使他能够在1870年反抗教皇无谬说，践行一种非常朴素的私人信仰。我相信自己从他身上继承了对历史的热爱以及对教会事务的由衷关心。我希望罗兰·希尔这部充满同情心的传记，可以向读者解释我祖父令人费解的个性，促进对他的怀念。他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愿他安息。

牛津郡马钦姆小修道院

序

欧文·查德威克

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格莱斯顿的首席私人顾问，对英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独特贡献，他的一句话现在已成了英语民族的格言。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名人死后不久便会有传记问世，而且通常是两卷本形式。阿克顿则不然。当时的报纸发布过详略不同的讣告，他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在《国家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中为阿克顿撰写了一条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的小传。阿克顿曾给格莱斯顿的女儿玛丽写过不少精彩的信，她出版了这些信件，引起世人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杰出的书信体作家，还因为在他的个性方面，地位崇高却又让人感到陌生，或至少是个复杂的人物。这些信件的编者赫伯特·保罗写过另一本简明实用的传记。晚近许多人试图写阿克顿的生平，有些人揭示了他人生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阶段，不过，若以全面的传记作为目标，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

任何为阿克顿作传的计划，都会遇到非比寻常的困难。首先，他是个欲罢不能的短小笔记收集者，他预期这些笔记以后会对历史研究或写作有用。因此，他死后的主要遗物是一大堆文件，多数是卡片索引的形式，这些文件不仅包含过往历史的材料，还有他关于同代人和自身经历的文字。这些文件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任何传记作者都可取用，想为他作传的人也必须利用。但最大的困难是

如何有把握地使用这些材料。殊难断定这些笔记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阿克顿本人的意思：是仅仅抄录别人的话，还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一贯的想法，抑或只是在卡片上记下了一时的判断？再者，有些卡片令人好奇地罗列了一系列历史学家，他们都持有同一种观点或类似观点，它们在特定时刻引起了他的思路开阔的头脑的关注。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资料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但是仅靠这些材料并不足以了解必要的生平事迹。

第二个困难是，任何试图考察阿克顿信件的作者，需要寻访西欧各地的图书馆。阿克顿虽然是个英国乡绅，却只能算半个英国人。从他的直系祖先那里，他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接受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教育，这对他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就像在伦敦、剑桥和牛津一样，他在巴黎、博洛尼亚、慕尼黑和维也纳也有许多好友。他用三种语言写信。德国的朋友有时用老式哥特体给他写信，这种手写体不同于印刷体，除非是德国的老哥特人，一般读者很难读懂。可以说，任何打算写阿克顿生平的人，差不多需要像他那样是一个欧洲人。

第三个困难最麻烦。阿克顿一出生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他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成了深入批判教皇制度的人。当时教皇权力正处于危境，亟须信徒的绝对忠诚。阿克顿的子女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尊敬父亲，却并不接受父亲对教皇制度的看法。阿克顿的这种观点在已经出版的信件中已十分突出，而他的孩子们（拥有阿克顿的大量私人信函）并不希望让这种观点更加显眼。除非能利用这些信件，任何传记作家都难获成功。

在阿克顿后裔中，对学术研究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孙女米娅·伍德拉夫，她既迷人又有学者气质。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相关学者——如达米安·麦克厄尔拉什、詹姆斯·C. 霍兰德、约瑟夫·L. 奥斯欧兹和维克多·康泽米乌斯——获准发表了以往从未刊印的信件。康泽米乌斯出版了阿克顿和他的慕尼黑导师伊格纳兹·

冯·多林格——对阿克顿而言，他是父亲般的形象——的大量通信，使对阿克顿的研究焕然一新，因为较之玛丽·格莱斯顿、阿克顿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和雷金纳德·维尔·劳伦斯先前出版的信件，阿克顿在这些信件中透露了自己更多的思想和内在个性。最终，在1973年，阿克顿家族拥有的全部信件被移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与阿克顿的藏书、早期的卡片索引和其他资料合并到一起。这使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完整的传记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阿克顿的声誉在晚年达到顶峰，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相信且也有理由相信，依靠他的神奇声誉，讲述欧洲历史的一套系列丛书可以获得可观的销量。这套系列丛书——《剑桥现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这些书叙述的年代逐渐前移，因为阿克顿的主要兴趣是现代史）——的出版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每卷都冠有阿克顿的大名，因为是他策划了这一方案并找到最初的撰稿人，虽然他在丛书第一卷出版前便已辞世。

随着独裁者时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到来，阿克顿也获得了另一种名声。他的历史直觉和个人道德信念，使他痛恨一切暴君。曼德尔·克莱顿担任过由阿克顿协助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主编，撰写过从天主教大分裂（Great Schism）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制度史，这是一个能触动阿克顿心弦的主题。克莱顿的遗孀露易丝很快出版了丈夫的《生平与书信》（1904），其中包括阿克顿致克莱顿的几封信。阿克顿一封信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阿克顿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渐渐消退。事实上，为防止他的剑桥史过时，不断有新的作者加以修订更新，新版有时也有价值，但似乎往往不如老版有益。现代学术界在评判历史学家时，是看他们发表过什么观点，而不是看他们自己拥有的藏书或他们所掌握的大量事实。阿克顿发表的著作寥寥无几，部分原因是时间有限——他最初主要办杂志和参政，而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但他确

实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历史。然而他总是觉得，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事物，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拒绝承认所有的史学著作、小册子或论文只能是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中期报告。此外，他对搜集过去的知识有着强烈的癖好，以至于总是能找到新材料，他厌恶安心于以既有的材料做文章。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他的名气，人们往往认为他没有发挥应有的才能，向世人贡献更多的成就，还有人认为花时间研究一位“失败者”是个错误。

然而，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迷人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传记作者需要对历史进程抱以同情，并能对阿克顿在其中的独特工作产生共鸣；还要理解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在 19 世纪遇到的尖锐冲突——既有罗马教廷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也有教会内部的冲突；需要有对欧洲的个人经历并熟知欧洲史，尤其要关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天主教，以及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温和派；此外，他还需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有总体的了解，他们主持的优秀期刊能够为深入探讨问题的长篇大论提供版面，这是他们在 20 世纪格局狭小的后继者所做不到的。

罗兰·希尔符合以上所有标准。他是米娅·伍德拉夫及其家人的朋友；他受过历史学训练；凭自己的理智和经验，他能够深入到阿克顿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生活背景之中；他对自由派天主教朝着阿克顿指出（有些古怪或夸大其词）的道路前进抱以同情。阿克顿留下的大量资料如今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材料并没有消除他的复杂性，但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对于想要探讨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个难题的人来说，较之他的任何微妙的政治言论，他的政治信念仍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非常欣赏罗兰·希尔的新作，并热情地把它推荐给读者。

致 谢

我对阿克顿勋爵的生平和著作感兴趣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位是戴维·马修主教，他是阿克顿两本传记的作者；另一位是道格拉斯·伍德拉夫，他担任英国天主教周刊《铭文》（*Tablet*）的主编长达三十一年；正是在这家周刊的工作，开启了我的记者生涯。马修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钦佩这位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以及他在天主教事务上的开明观点。伍德拉夫的妻子是阿克顿勋爵的孙女，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曾协助她丈夫重新出版了阿克顿早年的数篇论文，标题是《论教会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二十年里，特别是在英美两国，出现了阿克顿研究的复兴，带头人是G. P. 古奇，他在剑桥大学时就认识阿克顿，也认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欧文·查德威克和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德国的乌利齐·诺亚克早在1935年、1936年和1947年就分别发表过对阿克顿的研究成果。那一代学者仍然认识一些与阿克顿这位大史学家有私交的人。然而，我大半生担任德国和奥地利多家报纸驻伦敦的记者，此后才有机会进一步研究阿克顿，阿克顿家族的人、阿克顿勋爵四世和道格拉斯·伍德拉夫的遗孀、不久前去世的霍恩·米娅·伍德拉夫，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支持。她的友谊和积极关注对我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她虽然未曾见过祖父，然而她是家族中唯一对她祖父保持着特殊兴趣的人，对其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也了若指掌。她见过阿克顿的妻子玛丽及其长女米娅，她也认识德鲁夫人（玛丽·格莱斯顿）。当阿克顿家族在什罗普郡的奥登翰姆祖宅出售

阿克顿勋爵

时，伍德拉夫夫妇将阿克顿的大量私人文件保管在他们邻近阿宾顿的马钦姆小修道院的家中，直到这些信件被永久性移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阿克顿大量的私人藏书早已收藏于此）。米娅·伍德拉夫了解祖父的个性和生平，对我撰写这部传记有着莫大的帮助。

首先我非常感激谢菲尔德学院（Shepherd College）的詹姆斯·C. 霍兰德教授的无私帮助和建议。他是一流的阿克顿专家，学识渊博，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他遵循阿克顿的传统，尊重别人的见解。他无偿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使这部著作得以成型，虽然我必须声明，本书所提供信息的准确与否完全由我本人负责。他对本书的信任对我很重要。能得到霍兰德教授这样的指导老师实属幸运，他与约瑟夫·L. 奥斯欧兹、达米安·麦克厄尔拉什一起作为编辑组成员，参与了阿克顿与辛普森通信集的出版。阿克顿早年从事杂志工作时的重要书信必须重新整理出版，以消除对阿克顿的误解：由于玛丽·格莱斯顿当初草率地将阿克顿写给她的私人信件出版，似乎让人对阿克顿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于是才有了阿博特·加斯奎特的《阿克顿勋爵和他的朋友圈》（1906）一书，他带着党派偏见试图为阿克顿的正统天主教信仰“正名”。随着阿克顿大量通信的发表，这样的澄清工作事实上已变得不再必要。我对我的学术搭档玛丽·格里塞·霍兰德博士深表感激，她在关键时刻对本书的多个章节作了艰辛的压缩和校订。霍兰德教授和霍兰德女士目前正筹划编写一本阿克顿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集的学术版著作。

卢塞恩州的维克多·康泽米乌斯博士编辑出版了出色的四卷本阿克顿、多林格和布伦纳哈塞特通信集，这是理解阿克顿生平和思想的基础。这一重要学术著作消除了有关阿克顿著作的许多模棱两可之处。此外，康泽米乌斯博士在许多学术论文中，揭示了伟大的多林格及其英国弟子生活的不同侧面。我感谢他的忠告、支持和款待。我要向尊敬的欧文·查德威克教授深表谢意，他对阿克顿的性格很有洞见，也对我的手稿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为本书所作的序言让我倍感荣幸。我的良师益友，伦敦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霍华德博

士，为我提供了有关 19 世纪的深刻历史知识。

承蒙女王陛下恩准，我得以引用现藏于皇家档案馆的维多利亚女王日记，以及格兰韦尔勋爵、格莱斯顿以及庞森比勋爵与阿克顿勋爵相关的信函，在此向她表达谢忱。我要感谢温莎城堡图书馆馆长奥利弗·埃弗雷特先生及其彬彬有礼的员工经常为我提供的帮助。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前保管员 A. E. B. 欧文博士（他也为图书馆保存阿克顿勋爵的私人文件出过力）、他的继任帕特里克·祖特希博士，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保管室主管戈弗雷·沃勒先生以及这个巨大学术宝库的其他热心人士，都为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在读博士波伦迪纳·加洛韦，为我细心查阅了各种各样的档案和印刷材料，对此我深表感激。我也要对安·霍夫斯特拉·戈劳格表示感激，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专业帮助，在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前，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审校。苏珊·柏克以她的技能和耐心，为我打出了常常有改动的草稿，我要向她致以特别的感谢。我要对耶鲁大学出版社出色的手稿编辑表示感恩；简雅·魏恩雷布对细节观察入微，在叙述技巧上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向她深表感谢。我也要对洛普夫人第三期慈善计划的慷慨相助以及克里斯平·洛普先生对阿克顿思想的同情与理解表示特别感谢。我从博洛尼亚的阿奇吉纳西欧图书馆（Biblioteca dell'Archiginnasio）——明格蒂书信集的保管处——那儿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感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务长和诸位学者，他们使我得以引用奥斯卡·布朗宁的书信，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院长和同事们，他们使我得以引用彼得莱·佩奇·雷努夫爵士的书信。我要对米罗斯拉夫·库若拉奇博士——克罗地亚艺术学院历史研究所（位于萨格勒布，这里保管着阿克顿写给约瑟夫·斯特罗斯迈耶主教的信）的所长——深表感谢。我也要向罗德里克·施怀雅夫妇——什罗普郡奥登翰姆庄园现在的所有者——表示感谢，他们友好地带着我参观了阿克顿的故居。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查尔斯·伯恩斯蒙席，十分友善地向我讲述了这所古老图书馆的复杂内情。

阿克顿勋爵

那不勒斯的弗朗西斯科·勒庞冉托·迪·阿克顿男爵和佛罗伦萨已故的哈罗德·阿克顿爵士，与他们两人的交谈令我受益匪浅。巴伐利亚埃尔朵夫城堡的阿尔科·瓦莱伯爵夫人，沃里克郡库格顿小镇的安·特威男爵夫人，沃尔姆斯的欧洲议会议员、教授奥托·巴东博士，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阿道夫·M. 伯克教授，达拉谟郡罗斯米尼议会尊敬的丹尼斯·克利里，汉堡的马里恩·杜荷夫伯爵夫人，什鲁斯伯里的什罗普郡议会档案室的 M. T. 哈尔福德夫人，瑞士奥尔滕的布鲁诺·B. 海姆大主教，沃尔姆斯的海尔·祖·赫什米男爵夫人，罗马的卡雷尔·卡斯特阁下，慕尼黑教授戈特弗里德—卡尔·金德曼博士，什罗普郡布里奇诺斯的卡农·鲁道夫·洛茨卡，奥地利格拉茨的马克西利米安·利布曼教授，德国富尔达市法萨内利城堡的尼科莱特·卢瑟小姐，以及柯赫斯克·豪斯梯夫特通，柴郡塞尔市什鲁斯伯里教区档案馆的 P. 马米恩司铎，伦敦西格雷夫和斯托顿镇的查尔斯·爱德华·劳德·莫布雷，英国剑桥的 J. S. 讷瑟司铎，罗马的玛利亚·佩森蒂尼博士，西敏寺教会档案馆前档案员伊丽莎白·波伊泽小姐，以及现任档案员尊敬的伊恩·迪基，伦敦的西蒙·雷诺兹夫妇，罗马的普兰斯·卢多维克·罗斯皮廖西，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保管员罗伯特·斯马特博士，爱丁堡的法比耶娜·史密斯女士，维也纳的伯纳德·施蒂尔弗里德博士，伦敦的特伦斯·韦勒先生，英国剑桥的约翰·威尔斯先生，英国伯明翰奥拉托利修会教长格里高利·温特顿。以上诸位均向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密歇根大溪城的阿克顿研究所让我受益匪浅，多亏了它持久的兴趣和支持，使本书得以付梓。我真诚地希望，倘若本书值得称道或提升了阿克顿勋爵的名望，这应归功于该研究所对这项工作的真诚相待。

我尤其要感谢马丁·布雷特和特里萨·布雷特两位博士，我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期间，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玛吉特·克罗齐数年里忠诚地提供秘书服务，我对她深表感谢。最后但同样重要的

是，我要把赞美送给妻子爱米丽娅，感谢她长期的忍让，尤其是她作为意大利人天生的常识和想象力，对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用法语和意大利语写的私人信函，可以辨别其用词的确切含义。

我从莱昂纳多·孔特·威斯康提·迪·莫德隆那儿得到了阿克顿的族谱，对此我深表感谢，他本人与阿克顿家族的意大利支系有亲属关系。这个族谱自然做了压缩。完整的族谱名为《费尔南多和弗朗西斯科·阿克顿编制的阿克顿族谱》（*Genealogia degli Acton a cura di Fernando e Francesco Acton*），1969年在那不勒斯由私人出版。

即使按照英国或欧洲大陆的权威著作，贵族爵位的名称也不统一，故而对于姓氏的拼法，本书只能以保持前后一致作为宗旨，不求具体拼法的准确。如阿克顿的母系祖先，热那亚人布里尼奥莱·伊·萨勒，在全书中通称为布里尼奥莱·萨勒（现在的通用名）；与之类似，阿克顿在慕尼黑的亲戚的姓氏使用了连字符，写为阿尔科—瓦莱。当阿克顿的表叔和未来的岳父马克西米连·阿尔科伯爵（1806—1875）继承了大片领地，因此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那儿获得了附加爵位（为了与其他阿尔科家族分支相区别）之后，就不允许再用这种写法了。

目 录

- 米娅·伍德拉夫的话 / 1
- 序 / 3
- 致谢 / 7
- 导言 / 1
- 第1章 生于那不勒斯 / 7
- 第2章 世界主义的家庭背景 / 13
- 第3章 前往奥斯科特 / 26
- 第4章 多林格博士的门生 / 41
- 第5章 发现了新家 / 58
- 第6章 乡绅生活 / 77
- 第7章 三次旅行 / 92
- 第8章 愉快的格兰韦尔勋爵和妈妈 / 115
- 第9章 束手束脚的主编 / 148
- 第10章 玛丽同意了 / 209
- 第11章 罗马的殷勤 / 229
- 第12章 不速之客 / 252
- 第13章 教皇无谬说及其后续 / 276
- 第14章 宗教的不幸 / 294

- 第 15 章 格莱斯顿的反击 / 326
- 第 16 章 未来的圣母，过去的友谊 / 359
- 第 17 章 “权力导致腐败……” / 388
- 第 18 章 多林格去世 / 402
- 第 19 章 格莱斯顿的朋友和女王的侍臣 / 432
- 第 20 章 钦定讲座教授 / 473
- 第 21 章 晚年 / 505
- 注释 / 535
- 参考文献 / 657
- 索引 / 691

导 言

阿克顿勋爵这位伟大的学者和史学家，长久以来被他的同代人和后来的学者视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谜。他有一幅令人生畏的维多利亚外表：络腮胡子乌黑浓密，晚年则变为灰白色；明亮的蓝眼睛，嗓音洪亮，举止优雅，贵族气派十足。他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如同在家乡一般，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意大利语则稍显逊色。他有着极为英国式的矜持，通常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不过他的私人信件表明，他会向为数不多的亲友敞开心扉——他的“教授”伊格纳兹·冯·多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他的姨妈和后来的岳母阿尔科（Arco）伯爵夫人，还有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女儿玛丽·德鲁（Mary Drew）和生于德国的作家夏洛特·布伦纳哈塞特（Charlotte Blennerhassett）以及他自己的女儿们。

他对自由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思考，肯定仍然与今人相关。比如他指出，捍卫自由之要旨，不仅在于防范它的敌人，更要防范它善意的朋友。他对天主教会忠心耿耿，自称珍爱天主教会及其信众胜过爱自己的生命。然而，阿克顿并不全心服膺“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尽管他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天主教徒，理所当然地关心教会内部的自由和它所享有的自由。毋宁说，他从根本上关心的是真理，是真理多么轻易地被其表面上的仆人所操纵——以宗教或政治的名义——让人以为结果能证明手段的正当。

约翰·阿克顿爵士 1834 年 1 月 10 日生于那不勒斯，1902 年 6